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12

2009年2月23日

蘇聯解體的挽歌（下） ——兼談“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

黃元¹

三、對中蘇關係，特別是中蘇論爭的認識

中蘇之間的關係，一般的看法是，斯大林時代兩國關係密切，兩黨親如兄弟。1956年蘇共20大以後，即從赫魯曉夫的執政開始，中蘇兩黨關係逐漸走向破裂。原因是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對中國採取了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中斷了對華援助；對內則實行了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義路線；國際上則背棄了國際主義義務，改為執行蘇美爭霸主宰世界的社會帝國主義路線。事隔將近50年

¹ 作者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現為北京東方旋律文化藝術中心有限公司總經理。

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問題時，可以看到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1、斯大林晚年的中蘇關係。

根據歷史資料，斯大林時期的中蘇關係並非多麼美好。

1949年年底，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多月之後，毛澤東主席訪問了蘇聯。訪蘇目的是希望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替代1945年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伴隨著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還有11個協定或議定書（包括：〈關於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議定書〉、〈關於中長鐵路協定議定書〉、〈蘇中貸款協定〉、〈在新疆成立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協定〉、〈關於共同管理滿洲和遼東半島不動產的決議〉，以及其他有關貿易、航運等協議）。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有一個個人的願望，就是向斯大林說說“心裡話”，“訴一訴多年以來的委屈”。斯大林很精明。他知道這些所謂的“委屈”，實際上就是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失誤。聽毛澤東訴說“委屈”，實際上就是變相挨罵。所以他用一句話：“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把毛澤東擋了回去。加上“友好條約”的談判進展不順利，使毛澤東“悶悶不樂”，“寧可在別墅睡大覺”。

毛澤東要向斯大林所述的委屈，也就是中國黨與斯大林多年以前的“恩怨”。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失敗的直接原因是共產國際的路線錯誤，即把中國革命的希望寄託在了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身上。在中國革命的失敗問題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卻拒絕承擔責任，反而認為共產國際的領導“完全正確”，犯錯誤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陳獨秀。這種解釋當然可以瞞過一般普通的黨員，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的高層領導人，對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卻是心知肚明的。當時毛澤東尚未處於黨的決策人的崗位。所以此時斯大林的態度，還沒有使毛澤東真正感到“委屈”。但其後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干涉，則不僅

使毛澤東大權旁落，也使中國黨和紅軍幾乎全軍覆沒。1931年1月7日，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的米夫及其背後的斯大林操縱下，中國革命資歷上完全是黃口小兒的王明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縱。1933年1月7日，王明委派他的留蘇同黨——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等人，匯同其他中共主要領導人周恩來、項英等，將黨中央由上海遷至中央根據地瑞金。新到的黨中央，連同博古帶來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² 立即接管了毛澤東的一切權力，特別是軍事指揮權。由博古、李德、周恩來成立了“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王明則去了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繼續遙控中國黨。在此後的兩年裡（即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毛澤東實際上處於被排擠打擊，自身難保的境地。在三人團的指揮下，中央紅軍不但丟掉了中央根據地，且到了瀕於全軍覆沒的邊緣。毛澤東對這段歷史一直是耿耿於懷的。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雖然迫於斯大林當時的優勢地位，不能公開提及這些歷史問題，但至少認為當面“訴訴委屈”，進而能讓斯大林表個態，則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喜讀歷史，也喜歡作一些蓋棺定論的歷史性決議。所以對毛澤東來說，能得到斯大林對歷史問題的共同認知是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隨後的談判中，毛澤東也領教了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在就事關中國主權的旅順口和大連港的歸屬和駐軍問題、中長鐵路的所有權問題，斯大林均堅持維持原樣。中國方面對此則針鋒相對，要求：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國。斯大林則對中國的反提案表現出惱怒和憤

² 根據有關材料，李德似乎並非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而是博古私自任命的——作者註。

慨。經過幾番艱苦的談判，斯大林經過慎重的考慮和利弊（特別是關於外蒙獨立問題）的權衡，最終還是基本上滿足了中方的要求，並答應在兩年之內從中國撤軍。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簽字，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簽字儀式。表面上一切都很美好，但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猜疑和芥蒂卻又成為新的“怨氣”，使中蘇同盟從一開始就籠罩在不祥的陰影中。斯大林在毛澤東的逼迫下不得不兩次讓步，因而他甚至開始懷疑毛澤東會成為“第二個鐵托”。

1950年6月25日，在斯大林的支持下，金日成的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9月15日，以美國為首的15國“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被一分為二。9月28日，美軍攻佔漢城（即現在的首爾）。到10月初北朝鮮軍隊已經面臨著全軍覆沒的危險。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朝作戰。中國參戰可以說是挽救了瀕於崩潰的朝鮮人民軍及金日成政府。據說斯大林對此還頗為感動。但戰爭也使“我國財政赤字甚大，戰費極鉅”（周恩來語）。斯大林十分諳熟“找人賣命，花錢消災”的道理。鑒於要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中國與美國國力的懸殊太大，斯大林決定援助中國。

據《中蘇關係史綱》一書披露，斯大林在世時提供給中國的貸款共有七筆（最後一筆為他去世之後三個月）。如下：

（1）1950年2月14日實際使用金額12億舊盧布（即三億美元）基本全部用於軍事目的。（四個舊盧布合一美元）

（2）1951年2月1日實際使用金額9.86億舊盧布，全部用於軍事目的。

（3）1951年4月10日實際使用金額3.4億舊盧布，全部用於軍事目的。

（4）1951年9月12日實際使用金額六億舊盧布，全部用於軍事目的。

(5) 1951年9月15日實際使用金額0.38億舊盧布，用於經濟建設。

(6) 1952年11月9日實際使用金額10.36億舊盧布，全部用於軍事目的。(裝備60個師)

(7) 1953年6月4日實際使用金額6.1億舊盧布，全部用於軍事目的。

上述貸款總額為48.1億舊盧布，約合當時的12億美元。其中只有0.38億舊盧布用在了中國的經濟建設。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發動的，這筆錢實際上就是替他打仗的費用。但就是替人打仗，有些錢還得自己掏。中蘇之間就“軍事費用”的結算還是要以“半價”支付的。這筆錢，中國直到1964年才還清。需要說明的是，第一筆，即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友好條約》的同時所簽訂的關於12億舊盧布的貸款，時間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但這筆貸款後來幾乎也都用在了抗美援朝戰爭或與其相關的費用上。有些中國專家認為，斯大林發動朝鮮戰爭有一箭三雕的目的。其一是，阻止中國與美國的接近，乃至建立外交關係。其二是，在朝鮮找回失去的旅順和大連軍港。其三是，將整個朝鮮半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是否真的如此，筆者不敢妄下結論，但朝鮮戰爭使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推遲了20年，則是不爭的事實。

2、赫魯曉夫時代初期的中蘇關係。

根據史料，赫魯曉夫時代初期的中蘇關係也並非不和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在朝鮮戰爭進入和談時期突然去世。1953年7月27日美朝雙方簽署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結束。1953年9月3日，赫魯曉夫就任蘇共第一書記。開始了赫魯曉夫時代。由於赫魯曉夫不是一個能和斯大林匹敵的強勢領導人，所以在他上臺之初，不但需要得到國內的支持，也需要得到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聲援。從1954年起，中蘇兩國關係真正地

走向了蜜月時期，直至 1959 年，中國黨幾乎對赫魯曉夫的所有政治舉措都表示了全力支持。作為回報，赫魯曉夫則大規模地加大了援華的規模。

(1) 對蘇共 20 大和批判斯大林的態度。1956 年 2 月 14 日赫魯曉夫發表了公開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國黨立刻予以公開支持。在稍後 9 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年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批判了在黨內曾經造成嚴重後果的個人崇拜現象，而且提出了進一步促進和平共處和國際合作的主張，對世界緊張局勢的和緩做出了顯著的貢獻”。³ 鄧小平在其後的“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公開讚揚蘇共 20 大：“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⁴

在得到秘密報告的文本之後，中共領導人並沒有像朝鮮和越南黨那樣向全黨隱瞞“秘密報告”的存在，相反向廣大黨員原封不動地傳達了報告的內容。同時將其譯文印成 36 開的小冊子，隨“參考消息”向全國發放。對此李慎之後來寫道：當時毛澤東“似乎並不反對這個報告的內容從各種渠道洩露出去”。給人的印象是，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著實替毛澤東大大地出了一口惡氣。

毛澤東對蘇共公開批判斯大林做法的著名評價是 1956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即：“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這句話原本並沒有褒貶之意，也並不像後來人們所解釋的那樣說其含有否定蘇共做法的意思。當時中共的正式立場是，1) 中共應該表態，以支持 20 大姿態分析斯大林的錯誤；2) 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應該指出，“秘密報告”中也

³ 《中共八大文獻》，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55 頁。

⁴ 《中共八大文獻》，第 92 頁。

並沒有把斯大林說得一無是處，因此這種中共的立場與蘇共 20 大的正式立場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性區別。

在較為不公開的場合，毛澤東表達的意思更為清晰。1956 年 5 月 2 日，毛澤東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到：“蘇共中央勇敢而尖銳地提出了斯大林的錯誤問題”，斯大林的錯誤“可以寫一本書”，“但是沒有必要”，因為“對共同事業不利”；消除了個人崇拜之後，“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表示：“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上述毛澤東的講話表明，首先，斯大林的錯誤（包括對中國黨的錯誤）很多，但沒必要全都拿出來批判，因為“對共同事業不利”，這裡有策略上的考慮。其次，揭蓋子是必要的，因為“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可以放下斯大林帶給中國黨的歷史包袱。毛澤東從今以後也不需要再找人訴苦了。因為蘇聯黨已經替他做了這件事。至於“捅了婁子”一語，則可理解為政治上敏感的毛澤東當時已經預見到“批判斯大林”可能會帶來的一些麻煩，但因為中國黨在國內地位穩固，毛澤東也並沒有把這些麻煩視之為不得了的問題。

（2）蘇聯的對華援助。筆者在上文中曾提到，斯大林對中國的援助中有很多功利主義的成分。赫魯曉夫為了得到中國黨的支持，在對中國的援助問題上雖然不能說沒有自己的小算盤，但總的說來，他的援華態度要比斯大林積極得多，中國也因此而得以建立起了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為後來的工業化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1953~1957 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斯大林去世之後不久，1953 年 5 月 15 日，中蘇簽訂了《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規定在 1953~1959 年間援助中國新建、改建以及續建 141 個企業。然而，簽訂了協議，並不等於援建項目就可以付諸實施了。直至 1954 年 4 月 15 日，中方才拿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初稿，援建項目的很多細節尚未落實，就一些補充和修改意見雙方看法還沒有達成統一。1954 年 4 月上旬，周恩來在途徑

莫斯科時會見了赫魯曉夫，請他過問一下援建項目的進程。在推進這些項目的過程中，赫魯曉夫也確實遇到了不少困難。負責援華項目的蘇方外經貿部副部長科瓦立對赫魯曉夫明確表示，蘇聯能力有限，且該援建項目中有些“對蘇聯來說是非常複雜的，在技術上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但赫魯曉夫卻“拒絕聽取”這種意見，並指示要加快與中國代表團的談判步伐。此後很多草案在蘇聯各部委得以順利通過。1954年7月，中方提出對原方案進行“修正和補充”，並請求蘇聯再幫助建設一些新企業。赫魯曉夫答復為：“滿足中國政府要求”，將設計和設備總值增加了3.5~4億（新）盧布。並主動建議在援建的某些企業中，使用蘇聯的最新技術。

為向1954年的中國國慶獻上一份厚禮，赫魯曉夫經多方奔走促成了：將中蘇合營的新疆石油公司（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成立的，毛澤東曾十分反感），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大連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的蘇方股份無償轉讓給中國；幫助中國修建蘭州~阿拉木圖鐵路；將蘇軍提前從旅順海軍基地撤軍並無償將基地歸還中國；向中國提供5.2億盧布的軍事貸款，以及增加新建15個企業的項目，從而最終形成了後來人們常常提及的一五計劃期間“156個蘇聯援華項目”的規模。

據統計，1949~1960年間，援華的蘇聯專家達1.8萬人，其中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約為1.1萬人，1959~1960年不足兩千人。1956~1957年間，是蘇聯專家來華的高峰期。

同期，蘇聯無償（只收複印費）向中國提供的科技文件的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僅1955~1958年之四年間，蘇聯向中國無償提供了51792套技術文件。為50年代總數的70~90%。一五計劃期間，蘇聯將對社會主義國家科技援助總數的一半給予了中國。

生活在北京的人們都知道，1949年以前，北京只有清華、北大、燕京、輔仁等幾所大學。現在北京除北大清華之外的大部分專業院校，從北航、鋼院、石油、地質，到藝術院校的音樂、電

影、戲劇等學院，均是 20 世紀 50 年代由蘇聯援建的。

如此規模的援助，對蘇聯的經濟實力來說也是個相當沉重的負擔。《中蘇關係史綱》中披露“根據俄國檔案記載的數字，蘇聯援華建設項目的出口總值為 94 億盧布。其中設備出口值 84 億盧布，技術援助出口值十億盧布。有人算過一筆賬，這筆資金約佔 1959 年蘇聯國民經濟收入的 7%，當時在蘇聯可以修建 268 萬套公寓，在很大的程度上為國內城鎮居民解決困擾已久的住房問題”。⁵

對蘇聯的真誠幫助，我國領導人當時也曾給予過高度評價。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後，李富春曾評論說：“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如果沒有蘇聯的上述幫助，就不可能有如此鉅大的規模和速度，同時我們將會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從時間上講，一五計劃實施期間，正是赫魯曉夫執政時代的頭五年。

（3）關於蘇聯援建中國核武器和導彈工業的問題。蘇共 20 大之後不久，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爆發了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7 年蘇共內部又發生了企圖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的“倒赫”事件。中共在這些問題上均支持了赫魯曉夫。投桃報李，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蘇正式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1958 年 9 月 29 日，雙方又簽署了《關於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面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定》。兩協定中規定：

- 1、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
- 2、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和生產，並提供圖紙、資料和教學模型；
- 3、向中國出售鈾濃縮設備；
- 4、1959 年 4 月前交付兩個連的岸艦導彈設備，援建導彈部隊；
- 5、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

⁵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第 168 頁。

6、1961 年提供導彈樣品和技術資料；

7、派遣相關的蘇聯專家。

從此，毛澤東從建國之初就期盼已久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技術，開始在中國落戶。衆所周知，核武器和導彈技術是當時（現在恐怕也是）世界上級別最高的機密，也是牽涉到蘇聯國家安全，乃至世界戰略格局的至關重要的尖端技術。而當時掌握這種技術的也只是蘇美等為數不多的軍事強國。對該技術，不外露、不擴散，在蘇聯一直是作為國策來對待的。把核武器和導彈技術幾乎是無償地轉讓給中國，可見當時赫魯曉夫是下了多大的決心以期與中國保持長久的聯盟友好關係。

上述兩協定簽署之後，蘇聯派來了專家，送來了圖紙，各項工作迅速展開。1957 年年底開始，提取二氧化鈾和製作核燃料棒的工廠、核試驗場、核武器研製基地、鈾礦場等相繼進入設計和施工階段。1958 年 9 月蘇聯援建的七千千瓦重水反應堆和直徑 1.2 米的迴旋加速器移交中國。導彈方面，1957 年 12 月 20 日，蘇聯交付了兩枚 P-2 型地對地訓練用導彈。⁶ 1958 年 1 月 11 日，由蘇方任教，以該兩枚 P-2 導彈為實物樣品，中國軍隊舉辦了首期導彈訓練班。參加培訓的學員為 533 人，見習生 150 人，並在此後一年半的時間內共培訓了 1357 名專業技術骨幹。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親眼看到實物導彈為何物。1958 年 9 月，空軍成立了導彈學校，由蘇軍 12 名教員任教。1958 年 10 月 6 日，中國第一支地空導彈部隊成立，代號為 543 部隊。1958 年 11 月 27 日和 29 日，代表當時蘇聯最高軍事技術水平的四套薩姆-2 型地空導彈運抵北京，並有 96 人的蘇聯導彈專家與導彈同時到達。1959 年 10 月 7 日，中國軍隊第一次用地空導彈成功擊落臺灣空軍的 RB-57D 高

⁶ 赫魯曉夫的兒子在回憶其父時講道，蘇方還向中國提供了 P-12 導彈的圖紙和資料。——作者註。

空偵察機一架。空軍司令劉亞樓後來評價說：“1959年這一仗，完全是按蘇聯專家教給我們的辦法打的。”

1960年8月23日，赫魯曉夫下令撤走了最後一批在我國核部門工作的援華專家。蘇聯援助中國研製和生產原子彈和導彈的工作就此嘎然而止。從此我國開始了繼續自行研製原子彈和導彈的工作。1964年10月15日，第一個原子彈試爆。中國的原子彈從無到有，一般的講法是用了一年的時間，而且是“短短的”十年時間。文革期間國內也曾大肆宣傳原子彈是我國自行研製和生產的。應該承認1964年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中確有不少部分是我國科學家自行研製的成果。蘇聯對核武器的援助也是有限度的。但蘇聯不斷提高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層級，畢竟是中國能在短期內製造出原子彈的根本原因。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時蘇聯撤走專家，只是延誤了中國生產原子彈的時間而已。

3、赫魯曉夫執政後半期的中蘇關係 — 從友誼到分裂。

赫魯曉夫的執政時代總共為11年，即從195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其中前六年為中蘇友好時期，後五年中蘇關係則由兄弟般的友誼，逐步走向了分裂。赫魯曉夫倒臺之後，中蘇關係則更進一步地走向了對抗。

關於中蘇關係的破裂，以及當年意識形態方面中蘇大論戰的這段歷史，“這場論戰的參加者之一”，“扮演了並非無足輕重的腳色”的鄧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會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並正式宣佈兩國關係正常化時，作過一個經典的評論：“經過近30年的時間，應當承認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通常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向中國提出建立長波電臺和蘇中聯合艦隊的要求，是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民族自尊心的行為，因而被毛澤東嚴詞回絕。其後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借指責阿爾巴尼亞，指桑罵槐地攻擊中國，使中蘇兩黨的分歧公開化。此後赫魯曉夫不顧中國面臨的經濟困難悍然撕毀援華合同，給中國帶來

了鉅大的損失，以及在中印邊界衝突中偏袒印度。總之一切錯誤在蘇方，這種解釋至今還是國內媒體基本一致的說法。筆者曾經確信其原因和事實皆為如此。然而，根據近年來不斷披露的材料和當事人的回憶，發現情況也並非如是。回首毛澤東在兩國關係走向破裂的關鍵時期的某些做法，不但可以印證鄧小平的上述認識，也可以看到我國當時的很多做法也並非合情合理。

當時在外人看來，1958 和 1959 年間兩國關係是一片光明。中蘇雙方除了 1958 年 9 月 29 日簽署了《關於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面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定》之外，又於 1959 年 2 月 4 日簽訂了《關於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製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規定蘇聯政府賣給中國海軍五種型號的艦艇（包括：常規動力的導彈潛水艇，大中小型魚雷艇），兩種導彈（潛地和艦艦導彈），及相關的動力、雷達、聲納、導航等 51 項的圖紙、部分設備、專利。1959 年 9 月，赫魯曉夫簽署決議，向中國派遣多級火箭設計、水聲學設計、火箭儀器、紅外線技術、熱力自動導向頭、坦克穩定系統、大能量火箭液體燃料技術等方面的專家，協助中國完成設計工作。此外，蘇聯政府還做出承諾：從 1959 年開始，再向中國提供 125 個新建企業的援助。⁷ 但就在這時，中蘇間最初的不諧和音出現了。

長期以來中方將中蘇關係的惡化歸咎於“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問題。這兩個事件，也一直被視為赫魯曉夫覬覦中國主權的重大問題。

20 世紀 50 年代後半葉，蘇聯的潛艇已經開始在各大洋遊弋，蘇聯研製的核潛艇也開始進入服役期。當時還沒有衛星通訊。為解決遠洋的通訊問題，蘇聯當時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長波電臺。鑒於中國海軍是蘇聯幫助建立的，且中國自己在建的潛艇部隊也可

⁷ 1958/8/8 和 1959/2/7 兩政府協議。引自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第 242 頁。

以使用這一通訊設備，赫魯曉夫指示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於 1958 年 4 月 18 日致函中國國防部，建議在中國華南地區，共建一千千瓦大功率長波發射臺和收信臺各一座。共投資 1.1 億盧布，蘇方出七千萬，中國出四千萬。電臺建成後兩國共同使用。毛澤東閱後甚為不悅，指示彭德懷答復蘇方：同意在中國建設該設施，但電臺的建設費用全部由中國負擔，蘇方可以借用。至該年 7 月，蘇方曾幾次反復提出由“中蘇兩國共建長波電臺”的建議。直至 7 月 21 日，彭德懷再次致函馬利諾夫斯基，最終予以回絕。毛澤東堅持要求由中國出資修建長波電臺的目的是，表明電臺的所有權在中國，蘇聯只有使用的份。中方的這種回答令赫魯曉夫大為震驚。他不明白的是，在給與中國如此鉅大的人力物力的援助後，為何毛澤東連這點方便都不肯給。

長波電臺還沒有結果，又出現了聯合艦隊的問題。1958 年 6 月 28 日，周恩來致函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提供建造新型戰艦的設計圖紙和資料。7 月 21 日，蘇駐華大使尤金就此問題會見毛澤東時提出，蘇聯考慮到將來與美國共同作戰的原因，希望與中方建立一支聯合艦隊。毛澤東當即回答：“中國只請蘇聯提供幫助，沒有考慮過‘合作社’的問題。”尤金則表示，這只是一個提議。第二天毛澤東再次約見尤金並表示，撤銷希望蘇聯幫助建立海軍的要求。隨後說了一些較為衝動的語言，如：“你們不相信中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要合營，什麼都合營”，“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遊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等。毛澤東在會見中還特別發泄了一通對斯大林的長期積怨。赫魯曉夫接道尤金的報告後認為，毛澤東簡直是“莫名其妙”。7 月 27 日，尤金會見劉少奇，氣氛有所好轉。尤金表示：蘇方在援建中國海軍時，沒有任何政治條件，連暗示都沒有。劉少奇則再次提出：“請求幫助建立中國的海軍艦隊”。7 月 31 日，赫魯曉夫取

消了訪美計劃，就“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之事專訪北京。在和毛澤東的會見中，赫魯曉夫表示：“這是一場誤會”，“從來沒有向中國同志所想像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艦隊”。對毛澤東的反應，赫魯曉夫則表示：“我們沒有想到，毛澤東同志竟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侵犯主權的程度”。在談到“長波電臺”時，赫魯曉夫表示：蘇聯願意通過提供貸款的方式參加電臺建設，電臺的所有權“屬於中國”。蘇聯只希望通過協議，允許蘇聯使用該電臺。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可以取消這個建議。毛澤東則堅持：中國不需要貸款，如果蘇聯要出錢，中國就不搞了。不久之後，蘇聯自己發射了通訊衛星，“長波電臺”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關於“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談話如此便無果而終。筆者無意去評判在處理該問題時各方的是非曲直。毛澤東借這兩個問題，想發泄一下自己的不滿，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毛澤東亦很注意把握分寸。在整個會談過程中，他主要批評的還是斯大林及斯大林身邊的領導人，對赫魯曉夫甚至還讚許有嘉。當時的蘇聯，也的確沒有打算通過“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來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筆者只想說明一點，兩國關係中存在的不同意見和看法原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你提建議，我不同意，僅此而已。況且蘇聯當時也並沒有為了達到目的而強求中國或向中國施壓。反之，在會談過程中赫魯曉夫卻是連聲道歉。當時，就連劉少奇、周恩來至少也都沒有把“長波電臺”當作一回事。赫魯曉夫本人後來認為：“儘管毛偶爾粗暴地發作一下，我們那次談話總的來說是平靜友好的。”當時赫魯曉夫對會談的結果也還比較滿意。所以說，“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造成了中蘇關係的破裂有悖事實，是後來牽強附會的。

“響尾蛇導彈事件”卻真正是影響中蘇關係的一件大事。1958年9月24日，中國空軍繳獲了一枚美國“響尾蛇”導彈——臺灣空軍發射而未爆炸的，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導彈。蘇方知

道此事之後，通過駐華大使表示，希望中國能將導彈交給蘇聯。將來與中方共享分析結果和圖紙。蘇方雖多次索要，中方卻不予理睬。後來又推說中方正在尋找該彈，找到後再提供。中方的態度令赫魯曉夫十分生氣，表示要停止向中國提供 P-2 導彈的樣品。幾個月之後，中方做出了讓步，將這枚響尾蛇導彈交給了蘇聯，但卻拆除了關鍵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蘇方認為是中方有意扣留了這一重要部件。這件事使赫魯曉夫開始後悔自己將導彈和核技術交給中國的行為，並開始重新考慮在核武器和導彈技術方面的援華方針。赫魯曉夫甚至突然悟到蘇聯援建的導彈將來會不會對準蘇聯。據赫魯曉夫兒子的回憶，“響尾蛇導彈事件”之後，赫魯曉夫曾對他說：“P-12 就讓他們拿去吧，其餘的也拿去，原子彈可得再考慮考慮”。之後不久又說過：“我們把多少秘密都交給了他們，問題就出在一顆導彈上。”1959年6月20日蘇聯單方面停止了提供原子彈技術的協議。

筆者一直覺得，中蘇關係的破裂，與中蘇兩國領導人的不同文化背景不無很大關係，雖然這種文化上的隔閡並不是主要原因。

例子之一是，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上，發表即席講話。主要講了以下幾點：

(1) 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社會主義國家的實力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形勢大好，是東風壓倒西風。“資本主義國家永遠落在後邊了”。

(2) 支持蘇共對六月事件的處理。1957年6月，莫洛托夫集團企圖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未能成功，被蘇共定性為“反黨集團”。

(3) 提出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

(4) 表明對核戰爭的態度。即，不要怕核戰爭。世界上有27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發動原子戰爭，世界上也許會死去一半人，但還能剩下一半，人口仍然不少，還可以重新建設嘛。

毛澤東對核戰爭的態度語驚四座。莫斯科會議的與會者主要

是東歐和西方各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其國家大都剛剛經歷了二戰的苦難。莫斯科會議的主旋律是“和平共處”，儘量避免戰爭的爆發。所以一些領導人對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表示了氣憤。如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諾沃提尼曾向赫魯曉夫說道：“毛澤東說他有六億人口……我們怎麼辦呢？捷克斯洛伐克只有 1200 萬人。”我們中國人大都可以理解毛澤東的這番話有當時稱之為“革命浪漫主義”的成分，不過是要加重“不怕戰爭”的份量。為此，當時在座的宋慶齡還曾會心一笑。但在一向講話嚴謹的外交場合，這種即興講話給很多黨的領導人，包括對赫魯曉夫均造成了毛澤東對待戰爭的態度很不負責任，乃至好戰的印象。

例子之二是，1958 年 7 月 31 日，赫魯曉夫為解決“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而專程訪華。由於毛澤東對蘇方的提議十分不滿，所以在談話之後，即沒有按慣例留赫魯曉夫共進晚餐，赫魯曉夫又被安排住進了條件並不太好一個別墅。當時沒有空調，晚上赫魯曉夫熱得睡不著覺，在其隨從人員的幫助下，躲進了一個防空洞。防空洞裡蚊子成群，咬得赫魯曉夫幾乎一夜未眠。這件事給赫魯曉夫留下了很壞的印象。赫魯曉夫是一個性格上並不冷靜的人，此次在中國所受到的待遇，很可能對他在今後處理中國問題時產生了負面影響。實際上這種待客方式，也確實是缺乏中國傳統的大國風範。

另一個引起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是蘇聯對中國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態度。1958 年底，毛澤東認為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國已經找到了比蘇聯更快地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並認為：“蘇聯已經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還沒有過渡，落在了我們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面對中國畝產萬斤、土法煉鋼的宣傳，蘇聯表示了謹慎的懷疑。蘇共中央認為中共在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犯了急進盲動的錯誤，採取了一種左傾政策。但“為了保持蘇中關係的穩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讚，也不批評”。如果蘇方一直能夠保持這種姿態，中蘇友好關係也

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然而赫魯曉夫常常是藏不住事的，因而也每每口無遮攔。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發表講話，不點名批評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不通”，“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這一直指毛澤東得意之作的講話，最終激怒了毛澤東。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社論，也是公開不點名地駁斥了蘇聯領導人的觀點。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所造成的後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人直到20年後，即1979年的中共11屆三中全會之後，才開始反省當時的做法。現在看來，赫魯曉夫對人民公社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

中印邊界衝突使中蘇關係繼續惡化。1959年8月中印邊境發生第一次武裝衝突，蘇聯發表塔斯社聲明，對中印邊境衝突表示“遺憾”。1960年1月19日，周恩來接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表明：中印邊界衝突是印度挑起的，責任在印方。蘇聯則答復為：對該衝突的蘇方立場是：“嚴守中立”。周恩來隨即向契爾沃年科表示，中方對此感到驚訝，蘇方實質上是替印度辯護。赫魯曉夫下臺之後，繼任的蘇聯領導人曾就赫魯曉夫的錯誤進行過討論，其中將中印邊界衝突時蘇聯持“中立”態度一事，認定為赫魯曉夫的錯誤之一，也曾面告中方，承認其做法不妥。對外關係中，各國往往有各自具體的國家利益。中國的出發點無疑是捍衛中國領土。蘇聯當時更多考慮的是蘇印、蘇美的關係問題，以及蘇聯如果公開譴責印度的話，會引起印共全面崩潰的後果。當時的中蘇關係中，除了國家關係之外，還參入了“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成分。也就是說，在處理中蘇關係時，有“國家利益”和“國際主義”兩個標準。蘇方強調國家利益，而中國則強調國際主義義務。其結果，中蘇間的積怨變得越來越多。

到1961年年中，中蘇關係還勉強維持在友好水平。鑒於中國的經濟困難，雙方還簽訂了一些援華項目。1961年10月蘇共召開22大。中國派周恩來參加會議。會上中方就蘇聯借批判阿爾巴尼

亞之名，行批判中國黨之實表示不快。10月24日，周恩來提前回國，在機場上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的隆重歡迎。1961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譴責赫魯曉夫的聲明。赫魯曉夫則在22大閉幕詞中影射中共為“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者”。中蘇關係從此開始惡化。隨後出現的伊塔事件、蘇方全面撤退援華專家和停止所有的援華合同、古巴導彈危機等，最終使中蘇關係完全公開破裂。

4、中蘇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

孫中山先生臨終時曾留下遺言說：要“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歷史上就不用說了，中國的哪一個近鄰曾經不是俯首帖耳就是兵火相加。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只有割地賠款的份，哪裡見過“平等待我之民族”？20世紀60~70年代，那些“平等待我之民族”，均為弱小國家，反過來還要我們對之“平等相待”，給予各種各樣的援助。中國歷史上，給予我國大量經濟援助，並能平等相待的“民族”，其實就惟有“蘇聯”一家。一個國家，傾全國之力，幫助我國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現代化軍隊，除蘇聯之外，前無古人。是否是後無來者，筆者不敢妄言，但“後有來者”的幾率恐怕很小。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承認這個事實。我國在20世紀60~70年代，也曾無私地援助過如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弱小國家，中國人民省吃儉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後卻養虎為患，與之相繼反目，變成了仇家和敵人。中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幾乎就是中蘇關係的反向複製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在領教了這些援助友邦的可悲教訓，自己也感到痛心疾首之後，是否應該也客觀地反思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中國領導人在接受了如此鉅大的援助之後，中蘇關係反而走向了敵對，乃至戰爭的邊緣。

1959年是中蘇關係由好到壞的拐點。蘇聯當時除停止了原子彈的援助外，其他方面的援助仍有繼續擴大之勢，且並沒有不合

理的附加政治條件或歧視性條款。大批援華項目都在進行中。中國的國家最高利益，理應是繼續接受援助，以最終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現代化軍隊。受人以惠，只要不涉及國家主權，得讓人處且讓人。“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問題上，不同意就算了，蘇方又是連連道歉，何必如此大動肝火。況且，就算是建立“長波電臺”，也並無理由與主權問題連在一起。響尾蛇導彈的問題上，更是授人以柄。響尾蛇導彈不是中國製造，而是美國的技術。蘇聯把自己最優秀的導彈都給了中國，我們又何必把關鍵部件拆下來，把一個殘缺的導彈交給蘇方，顯得如此小家子氣？中蘇兩國，各有各的國家利益，之間的不合諧音總是難免的。那怕是做些小小的犧牲，維護兩國關係，就是中國的最大利益，應該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僅僅的這麼幾個事件，而且並不算嚴重的事件，處理得當，本來完全可以相安無事，怎麼就至於使中蘇關係走向全面惡化？“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外交則是國內政治的繼續。筆者認為，中蘇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於我國的國內政治。

1959年是召開廬山會議的一年。彭德懷在該會議上向毛澤東提交了意見書，闡述了他對大躍進的意見。會上彭德懷被定性為“反黨集團”頭目，並被懷疑為“裡通蘇聯”，與赫魯曉夫一唱一和。中蘇兩黨最終翻臉則始於1961年10月蘇共22大。三個月後，即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以總結1959~1961三年間（即三年困難時期）在經濟工作中出現失誤的經驗教訓，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這一書面報告在起草的過程中就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劉少奇雖然籠統表示三年困難時期的責任應由中央負責，但同時也提出，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敏銳的毛澤東立刻感到劉少奇的這一說法，是對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策的根本否定，並間接地指出了這一政策所造成的災難應由毛澤東負責。文革期間，毛澤東曾多次講過：“不該

退居二線”，“大權旁落”，以及1962、1963、1964三年是“牛鬼蛇神紛紛出籠”的時期，多次表明了他對“七千人大會”之後三年間劉少奇執政的憤怒。通常的說法是，毛澤東是從“七千人大會”開始下決心打倒劉少奇的。

劉少奇當時在黨內也是一個衆望所歸的人物，可不是用一兩句“犯了錯誤”的理由就可以趕下臺的人。他必須要代表一個反對黨的基本理念的路線，成為一個反對廣大民衆基本利益的代表人物，才可能受到全黨全國上下千夫所指。而赫魯曉夫卻正好成為提供這種炮彈的人物。赫魯曉夫不是斯大林，他沒有斯大林那種不可動搖的地位。只要把他能夠描述並定性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和復辟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則隨後可以順理成章地把與蘇聯有著共同想法的人物，劃為赫魯曉夫的同黨。毛澤東是個戰略家，懂得採取迂迴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他首先將斯大林主義和馬列主義等同起來，又將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做法和反馬列主義聯繫在一起。於是赫魯曉夫一切對斯大林體制的改革都成為了復辟資本主義的根據。雖然這一論斷當時就缺乏根據，但只要抓住一些違背列寧原話的言論，如全民國家、利別爾曼的“利潤掛帥”等，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現象，如蘇聯存在地下市場，或特權階層的工資收入高於工人數倍等，就可以使這種指責成為鐵案。在對外關係問題上，只要一提“緩和”，就可以立即解釋為“向美帝國主義投降”。待到自已將來要與美國緩和關係時，則可以再創造另一個，諸如“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自圓其說。如此由外而內，從赫魯曉夫到劉少奇，從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到發動文革，最後到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將劉少奇定性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和“叛徒、內奸、工賊”，毛澤東終於走完了把赫魯曉夫的帽子戴在劉少奇頭上的“倒劉”的全過程。中國對赫魯曉夫的批判，是一種指桑罵槐的行為。當年批判赫魯曉夫的〈九評〉等理論文章，則矛頭所向明為赫魯曉

夫，實為直指文革的發動，直指文革的受害者劉少奇。換句話說，〈九評〉等文章就是發動文革，造成十年動亂的理論基礎。

如果當年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批判，是指責他和他所繼承的斯大林的蘇聯國家制度違反了列寧主義的原則，因而是一個“復辟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雖然概念不很準確，但道理上還是說得過去的。然而，問題是毛澤東雖然也用了捍衛列寧主義的語言，但他捍衛的並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理念。毛澤東曾深受斯大林主義之害，在蘇聯公然批判斯大林的時候還實在是痛快了一把。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更符合他的需要。於是他選擇了斯大林主義，即他所稱的“刀子”，因為刀子是個實實在在的攻擊別人的武器。筆者認為半個世紀前的中蘇論戰，和列寧主義根本就沒有關係。

有人說，中蘇的分裂是毛澤東想成為國際共運的新領袖。也有人認為中蘇關係的惡化是雙方都沒有將“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進行正確定位，從而產生了中蘇國家關係間的雙重標準，也就是說不以同一個概念為基礎進行對話的必然結果。筆者認為這些原因都可能存在，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毛澤東置國家根本利益於不顧，利用製造意識形態分歧的辦法，來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中蘇關係破裂時，從來就未存在過蘇聯覬覦中國主權的問題。同理，那些受到中國援助後來又和我國反目的小國的所作所為恐怕也都出於同樣的其內部政治原因。當然，在處理和這些小國的關係時，中國當時也已經學會了用相當靈活的方式處理問題。如，我們曾慷慨地給予了阿爾巴尼亞大量的援助。當阿爾巴尼亞開始和中國突然反目，用了中國當年批判蘇聯時幾乎一模一樣的語言，大罵中國是“修正主義”、“向美帝國主義投降”時，也許因為這種事態本身就令中國領導人很尷尬，所以當時既沒有和阿爾巴尼亞進行論戰，也沒有宣傳阿爾巴尼亞如何忘恩負義，只是讓阿爾巴尼亞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事。

鄧小平對當年發生的中蘇論戰所作的評論，鑒於是在外交場合的發言，只能點到為止。回首往事，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蘇聯對華援助還是相當盡心盡力的，且在當時的對華關係中也並不存在後來人們所附會的“大國沙文主義”，更不存在對中國主權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觸犯。說蘇聯當時欺辱了中國，即不公平，更無從談起。中蘇分裂的原因主要在毛澤東，在於他在國內的政治目的。

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赫魯曉夫下臺之後，蘇聯經歷了長達 18 年漫長的“停滯時期”，即勃列日涅夫時代。這一時代之所以被稱為停滯時代，它的主要特點就是“停滯”。赫魯曉夫時代的一切改革，都停頓了下來。1980 年 10 月 23 日，當時蘇聯政府內一直試圖對現行體制進行適度改革的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被解除職務，思想保守、年屆七旬的吉洪諾夫繼任部長會議主席。自此，蘇聯完全進入了僵化的老人政治時代。1982 年 11 月 10 日勃列日涅夫去世。隨後蘇聯又經歷了兩個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安德羅波夫於勃列日涅夫死後第三天，即 1982 年 11 月 12 日繼任總書記，15 個月後（1984 年 2 月 9 日）去世。契爾年科於 1984 年 2 月 13 日繼任總書記，約 13 個月後（1985 年 3 月 10 日）去世。蘇聯在三年的時間裡，舉辦了三次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葬禮，幾乎是一年一次。在這三年的時間裡，還有三位重量級的政治局委員，即蘇斯洛夫（1982 年 1 月）、佩爾謝（1983 年 5 月），烏斯季諾夫（1984 年 12 月）也相繼謝世。老人政治不但從體制上，而且從自然規律的意義上也都走到了盡頭。1985 年 3 月 11 日年僅 54 歲的戈爾巴喬夫被任命為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

關於戈爾巴喬夫上臺前的蘇聯高層老人政治，戈爾巴喬夫寫道：“在勃列日涅夫擔任總書記的後期，政治局已經處於不可思

議的狀態。為了不讓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會議只開上 15~20 分鐘”，“與會者剛剛跨進門檻就得向後轉了”。⁸ 實際上勃列日涅夫晚年因中風而講話困難，在政治局會議上甚至會出現語無倫次的情景，已經很難在政治局討論任何問題，從而形成了各個政治寡頭處理自己領域內的一切問題，而且幾乎互不通氣、各自為政的局面。安德羅波夫雖然想做點事，但他在位時間太短。契爾年科執政的 13 個月，則完全是“病夫治國”。戈爾巴喬夫描述道：“他（契爾年科）弱不禁風，呼吸困難，氣喘吁吁”。“一個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於權力金字塔的頂峰”。⁹ 事實上，老人政治已經成為了蘇聯的恥辱和全世界的笑柄。蘇聯失去了舵手，只不過是靠著一種慣性在運轉。

戈爾巴喬夫接手的蘇聯已經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國家。到了勃列日涅夫晚期，政治局力所能及的工作僅限於維持現狀，所有改革的言論和行動已經無從談起。在斯大林晚期已經開始暴露出種種問題的計劃經濟體制，非但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所有的對該體制進行改革的努力又都回到了原點。強調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原則又佔了上風，對企業自主權和市場的作用又開始進行限制，整個蘇聯回到了老路。就這一段時期，戈爾巴喬夫時代的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寫道：“60 年代末，突然開始對改革進行公開限制……猶如剛剛喘過氣來，氧氣卻被切斷了。”蘇聯領導人最為恐懼的是“經濟民主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全社會的民主化”。特別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不僅讓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就連一直改革意識較強的柯希金都感到了“害怕”。¹⁰ 實際上，對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改革，一直就是靠行政命令佔有和支

⁸ 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92 頁。

⁹ 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第 114 頁。

¹⁰ 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6 年，第 42 頁。

配國家資源之官僚階級的軟肋。計劃經濟原本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在改革問題上，官僚階級本質上就是“保守勢力”。但蘇聯晚期，這種保守主義和老年政治的合流所帶來對社會基本活力的扼殺程度，在蘇聯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在保守主義和老年政治的影響下，空談之風盛行，大量問題議而不決或決而不行，社會風氣因而嚴重頹敗，經濟狀況隨之趨於惡化。各項經濟指標和西方國家相比也越來越拉開了差距。如，蘇聯科技發明在生產中的應用比例，60年代為二分之一，70年代為三分之一，80年代則為四分之一，呈明顯下降趨勢，而西方國家同期則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間。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糧食一直短缺，每年要靠動用黃金儲備進口糧食以彌補不足。這種狀況直到勃氏去世也沒能得到解決，造成了農產品和消費品長期短缺，市場供應緊張和排隊搶購等現象。1968年蘇軍出兵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後，經濟改革思想逐漸被取締，大量企業又重新開始虧損。勃列日涅夫執政晚期，無人經營，無人負責的現象十分嚴重，設備亦嚴重老化，40%以上的機械設備損耗度均超過了50%。

保守主義和老年政治的另一個特點是：好大喜功。閉眼不顧自己的國力，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就是其中一例。為此蘇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當了總書記之後，我才瞭解了國家軍國主義的真正規模”，“原來軍費開支所佔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1990年7月5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蘇共28大上提供了如下數據：在過去的20年中，蘇聯用於與西方對峙的費用為七千億盧布，在阿富汗損失了六百億盧布，與中國對抗用去了兩千億盧布，總共約為一萬億盧布。其中軍費為四分之一。為了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蘇聯到處插手——在亞洲，從印度到阿富汗，在非洲從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安哥拉到紮伊爾，窮兵黷武，肆無忌憚地干涉各國事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蘇美爭霸，首先是毀掉了蘇聯人民的

生活，最終毀掉了蘇聯。

面對蘇聯的頹勢，新上臺的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確有除弊革新的願望和勇氣。即位伊始，戈氏便開始了銳意的“改革與新思維”。在其改革之初他也確實給蘇聯帶來了新的政治空氣的希望。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既缺乏政治經驗，更缺乏實施和駕馭改革的能力。在個人素質方面，又有與他的前任一樣的華而不實，軟弱妥協，又缺乏主見，患得患失等致命缺點，因而最後非但沒能力挽蘇聯頹勢於狂瀾，反而最後葬送了蘇聯，給蘇聯人民帶來了鉅大的災難。

1、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早在 1984 年就已經認識到了結構改革的必要性。”在他即位之後不久，即 1985 年 6 月召開的科技進步討論會上，他對改革蘇聯經濟提出的設想是，“在一定程度上與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的改革方法頗為近似”。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不是鄧小平，他沒有鄧小平式的穩健而又務實的能力和路線，更沒有學到鄧小平的改革方法，最為缺乏的則是對各類改革方案的判斷力。他長期搖擺於兩個不同的方案之間，失去了最寶貴的時間。最後使蘇聯的經濟改革成為一紙空文。雷日科夫對此結論是：“總書記沒有綱領”。¹¹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期，經濟改革的主要口號是：“加速發展戰略”。對這一“戰略”的評價，戈氏自己都承認：“其範圍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已變得十分明顯”，“當時我們覺得，暫且先作作整頓工作，用老辦法對付一陣子，然後就立即著手進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這樣做是錯誤的，結果浪費了時間。”

“加速發展戰略”的目標是很輝煌的，但所用的方法則是計劃經濟式的。有點像我們當年的“洋躍進”。其主要目標是：到 20 世紀末，生產潛力要翻兩番，國民收入增加一倍，勞動生產率

¹¹ 雷日科夫：《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 2008 年，第 110 頁。

增長 1.3~1.5 倍，能耗降低 40%。具體辦法為：首先還是重點支持重工業的技術改造，擬撥款兩千億盧布完成這一改造過程。其次才是解決食品短缺的問題。就企業自主權和市場化的問題，該“戰略”預計從 1987 年開始，在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完全的經濟核算制”，讓企業自籌資金，自負盈虧。

本質上，加速發展戰略作為長期規劃並沒有大錯，1987 年大型國有企業直接面向市場的進程也應該不算很慢。它錯就錯在該戰略仍然沿用的是傳統思維，仍然立足於重工業的發展，立足於國家大型企業的科技進步和集約化，把將近 80% 的投資投在了見效慢、投資高、週期長的重工業，而將國計民生迫切需要的農產品和輕工業生產放在第二位。1987 年對重工業的投資為 665 億盧布，而對輕工業的投資僅為 85 億盧布，兩者相差甚鉅。因為未能改變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思想，蘇聯的結構性畸形狀態未有任何改變。消費品工業仍然資金短缺，困難重重。問題是，自蘇聯成立之後，經過國內戰爭、強制集體化運動、高速工業化建設、衛國戰爭、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人民基本上一直處於生活物資匱乏的社會裡。也就是說，除了赫魯曉夫時期短暫的較為富足的數年之外，蘇聯成立之後的將近 70 年間，人民大部分時間處於基本農產品和生活用品短缺，每天排隊數小時購物的困境中。經濟改革首先應該解決的是當前最為緊迫問題，以改善人民生活為第一要務，給吃夠了生活物資短缺苦頭的人民一些信心，使人民能夠認同改革，心甘情願地跟隨銳意改革的領袖將改革進行到底。然而，縱觀戈爾巴喬夫六年多的改革，人們看到的卻是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排隊時間一天比一天漫長。筆者在 1990 年，也就是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那一年曾訪問過蘇聯。一位隨團陪同的女士告訴我，她多麼希望能夠請我們到她家坐坐，但真的不好意思請我們去，因為連最為簡單的喝茶點心她都拿不出來招待我們。筆者當時看到的是，商店貨架空空如也，在中國

滿大街都是的皮鞋、服裝、小型家用電器在蘇聯無一不是緊俏商品。當時就感到，任何一國再有覺悟的人民，生活到了這種地步，恐怕對政府也已經不會再抱有任何希望了。戈爾巴喬夫後來反省的很對，因為指導思想的錯誤，他“浪費了時間”，而和時間同時失去的卻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雖然消費品市場一年不如一年，但在經濟指標上卻是成績喜人。1986、1987、1988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分別是：3.3%、2.9%、5.5%。但這些都是數字上的成績，增加的產值都集中在機器製造業。生產出來的機器，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主要都用來生產軍工產品或其他的機器設備。面對日益增長的對社會生活的不滿，以雷日科夫為首的蘇聯政府終於推出了改革蘇聯經濟結構的方案。

1987年6月，蘇共中央和政府制定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準則》。該《準則》要求：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實行完全的經濟核算，自負盈虧。國家則負責宏觀調控，即制定國家的發展戰略、速度、比例、監督質量、控制價格等。為此需要相應改革計劃、價格、信貸等體制。經過30年的猶豫彷徨，蘇聯終於第一次開始面對市場機制。到1987年底，有一半以上的企業和服務性行業實行了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經營。1988年5月，最高蘇維埃又通過了《合作社法》，包括飯館，商店，小工廠在內的小型企業得以迅速發展，並吸引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到1988年底，消費品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重工業的增長速度。但正如所有的根本性改革一樣，和取得一些成績的同時，新舊體制接軌的過程中蘇聯經濟出現了難以預料的混亂和失控。首當其衝的則是價格的失控。在蘇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既是企業的投資者、提供訂單的客戶，同時又是企業利潤的擁有者或虧損的承擔者。一旦企業獲得了自主權，可以自由支配利潤，國家又沒有相應建立起完善的稅收制度，結果是，政府收入銳減，大量資金留在了企業，

政府則只能舉債度日。到 1989 年初，政府預算赤字已達 1200 億盧布，而企業的閒置資金的結餘則達一千億盧布。加之從 1986 年起，提高職工的工資收入，增加了養老金、助學金，提高了教師、醫生的工資等，從而形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89 年蘇聯的價格還沒有完全放開，蘇聯的通貨膨脹造成的不是價格上漲，而是 445 個城市中約五分之一的城市實行了肉類，食物油，香腸的憑票供應，以及紡織品、鞋襪、內衣、香料、化妝品、練習本、煙葉製品、傢俱、自行車、家電、器皿的全面短缺。

經濟改革給蘇聯人民帶來的並非是福音。人們希望儘快看到經濟改革的成果，整個社會輿論亦開始向激進的改革傾斜。更由於戈爾巴喬夫所提倡的“公開性”、“民主化”等，強大的政治反對派已經形成，而他們又借助於民衆激憤的情緒，煽動民情，推波助瀾，致使災難性的“休克療法”的經改方案逐漸佔了上風。

為了應對經濟形勢的惡化和人們對經濟改革的不滿，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於 1989 年 12 月 13 日向全蘇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了新的經改計劃，即，建立“可調控的市場經濟”計劃。該計劃的宗旨是：“首先希望穩定形勢，然後繼續前進，邁向更加發達的商品貨幣關係體系”。在其計劃中，改革準備分兩步進行，即：1990~1992 年採取一套非常措施扭轉經濟局面。既採用嚴格的指令性經濟措施，也利用市場經濟的槓桿來克服日益增長的財政赤字和消費品市場的短缺。可以說第一步為三年期的過渡時期。第二步所需時間也是三年，即 1993~1995 年。期間要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使“市場更加積極地發揮作用”。雷日科夫堅決反對向市場經濟過渡時“一下子進行 180 度的轉變”以及國家“放棄計劃和經濟調節”的做法。他堅持認為國家應該依靠法律，對“價格、稅收、貸款和投資”進行有效的幹預。特別是因為價格問題關係到千百萬人民群眾的生活，其改革比較敏感，所以“不能一次性改變價格結構”。後來的事實證明，雷日科夫

的這一計劃是很有見地和遠見的。在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雷日科夫的政府計劃最終以 1532 票對 419 票獲得通過。最高蘇維埃責成政府於來年春季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1990 年 5 月，戈爾巴喬夫在總統委員會上讚許並肯定了該計劃。

1990 年 6 月 13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再次審議“分析研究了包括中國，波蘭的經驗，計算其結果後提出”的建立“可調控市場經濟”計劃的具體方案。由於麵包和食品的漲價問題引起了尖銳的爭論，該方案未能獲得支持，並責令政府於該年 9 月 1 日提交對具體實施方案，特別是控制零售價格方法的修改意見。“由於決策時間推遲到 9 月 1 日，……建議中的許多措施就已失去了意義”。¹² 戈爾巴喬夫對雷日科夫計劃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特別是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審議該計劃時，並未全力支持雷日科夫。因為錯過了時機，這一建立“可調控市場經濟”計劃最後未能逃脫成為一紙空文的命運。

應該說雷日科夫的改革方案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也是比較穩健的方案。它不但集中了雷日科夫以及諸多方面專家的多年治國智慧，也充分考慮到了蘇聯人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當時該方案也被稱之為“先穩定後過渡”的方案。可惜的是，被多年積怨所左右的蘇聯人民，不願再忍耐六年的時間。在被稱之為“民主派”的激進的反對派勢力煽動下，蘇聯社會的相當一批人不但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也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和理性思維的能力。政治口號，特別是個人情緒成了許多人們評判經濟問題的標準。

1990 年春，亞夫林斯基提出了一個急速進入市場經濟的計劃，後經沙塔林修改後成為著名的“五百天計劃”，也稱之為“亞夫林斯基~沙塔林計劃”。該計劃的理論基礎就是 80 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Sachs）發明的“休克療法”。1990 年 5 月 29

¹² 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第 355 頁。

日，與戈爾巴喬夫積怨甚深的葉利欽以微弱多數險勝俄共推薦的候選人，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6月9日，剛剛當選的葉利欽便接過了“五百天計劃”，在電視講話中承諾：“我打算提出五百天穩定形勢的改善生活的綱領。我需要預支信任兩年，最多三年，兩年穩定形勢，第三年生活好起來”。此時的戈爾巴喬夫也開始轉向支持“五百天計劃”。

“五百天計劃”實際上是一個十分激進，冒險以及不負責任的計劃。它利用民衆急於求成，急於改善生活狀況的心理，以煽動人們推翻政府為目的，只考慮政治效果，根本不考慮可操作性、人民的承受能力和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主張在下述四階段共五百天內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1) 開始一百天為第一階段，即改革的準備階段。在該階段主要完成對國有資產進行清算。同時宣佈土地私有化，使集體農莊莊員可以帶著土地及其他財產退出集體農莊。此外還有：出售蘇聯的外債和減少財政赤字等。

(2) 從第101天到第250天為第二階段。主要內容為開放價格，即取消國家的價格調節，由市場自己決定價格水平。此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一批國有資產，吸引外國投資，在商業和飲食業大力推行私有化。

(3) 從第251天到第400天為第三階段，即穩定市場階段。在此期間工業固定資產的40%、建築業和汽車運輸業固定資產的50%、商業服務業固定資產的60%實行股份制、出售或者改為租賃。同時完成價格的全面開放。

(4) 從第401天到第500天，為經濟增長期。期間將實現經濟的全面繁榮。

也就是說，葉利欽、沙塔林等人向人民作出了童話般的承諾：五百天之後，蘇聯人民將會看到一個初步繁榮昌盛，一片光明的蘇聯。

伴隨著五百天計劃的提出，葉利欽在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發起了打倒雷日科夫政府的浪潮。1990年9月1日葉利欽在總統和聯邦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言，宣稱：“實現沙塔林計劃的首要條件是雷日科夫政府下臺。”1990年9月16日，在葉利欽等人的組織下，莫斯科有數萬人冒雨集會，高呼：“支持五百天綱領”，“雷日科夫，人民不需要你”，“蘇聯政府應該辭職”等口號。

1990年9月17日，俄總理西拉耶夫宣佈俄聯邦從當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五百天計劃。9月20日，俄議會再次掀起倒閣浪潮，以164票對1票通過“關於蘇聯政府辭職的決定”。

戈爾巴喬夫對五百天計劃的態度則是：他本人“更欣賞沙塔林計劃”，但又反對“國家的所有政治機構進行大換班”，反對雷日科夫下臺，採取了典型的折中主義的態度，即等於什麼也沒說。9月17日戈爾巴喬夫再次重申“不能接受打倒政府的要求”。1990年10月15日，戈爾巴喬夫又杜撰出並簽署了一個“雷日科夫計劃”和“五百天計劃”的折中方案——《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提交最高蘇維埃討論。隨後該方案以333票對12票獲得通過。該方案一出籠就受到了葉利欽的抨擊，說它“把激進的和保守的計劃揉在一起，如同刺蝟與蛇同居”。至此，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案因為受到蘇聯最大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抵制，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實施的可能。1990年12月，雷日科夫向戈爾巴喬夫提出辭職。1991年1月雷日科夫正式辭去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蘇聯的經濟改革從此偃旗息鼓。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僅八天后，即1992年1月2日起，在葉利欽及其總理蓋達爾的領導下，獨立後的俄羅斯將“休克療法”付諸實施。放開物價後，俄羅斯市場並沒有出現總統向人們的許諾的貨架充實、物價穩定的結果。俄羅斯人看到的仍然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失業增加、犯罪上昇、社會動亂的局面。人們不僅未能從民主中得到幸福，也未能從市場經濟中獲得實惠。

據專家提供的數字，1990~1998年俄羅斯的GDP下降至57%，通貨膨脹率十年累計為兩千倍。¹³ 另根據雷日科夫所提供的數字，1994與1990年相比，國內總產值下降水平為50%，進口食品為50%，人均壽命為65歲，下降了五歲。僅1992年一年內物價就上漲了32倍，1993年物價又上漲了8.4倍。¹⁴ 嚴重的通貨膨脹使俄羅斯人民一生的積蓄蕩然無存，社會保障系統的崩潰又使大量的養老金領取者（包括工人也包括學者，退役軍人，退休幹部）淪為赤貧。雷日科夫對此評論說：蓋達爾“頃刻之間把人們微乎其微的積蓄掠奪一空，首先是把老人的積蓄搜刮殆盡”。¹⁵ 鉅額財政赤字則使國家公務人員，軍人長年領不到工資。連駐外使館都只好靠發簽證自謀財路。俄羅斯從一個經濟與軍事大國而淪為三流窮國。我國學者王小魯對此評價說：“除了二戰，什麼災難也沒有這個大”。¹⁶

葉利欽美好的許諾尚言猶在耳，面對這種結果，人們憤怒了。他們走上街頭，向葉利欽以及他所支持的蓋達爾政府表示抗議。這些人中有前共產黨人，前蘇聯軍人，還有新興的民族主義分子，甚至還有昔日葉利欽的忠實擁護者。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被迫下臺。

我們經常講：人民是偉大的，要相信人民是正確的。雷日科夫在他的著作中將葉利欽稱之為騙子，將他描繪成為一個為一己之私可以不顧人民福祉和國家利益的無恥狂徒。但葉利欽畢竟是俄羅斯人民推舉的領袖。當人民對戈爾巴喬夫失去信心時，他們

¹³ 〈俄羅斯的改革比中國更成功嗎——對話王小魯、姚陽〉，《南方週末》2008年7月10日，第C14版。

¹⁴ 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第394頁。

¹⁵ 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第281頁。

¹⁶ 〈俄羅斯的改革比中國更成功嗎——對話王小魯、姚陽〉，《南方週末》2008年7月10日，第C14版。

轉向了葉利欽。應該說葉利欽，乃至他的“五百天計劃”均為俄羅斯人民的選擇。而當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大錯已經鑄成。人民也會犯大錯的。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集體無意識”。在很多的歷史關頭，正是過度情緒化了的人民自己選擇了災難，而最後又不得不咽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2、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述及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恐怕無人不認為他的這一改革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的結果不但把蘇聯推向了混亂，使蘇聯轟然解體，他自己也逐漸成為無國可治的總統，直至最後失去了總統的職位。

出現這種結果的真正原因還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沒有弄懂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政治是經濟關係的總和，政治改革雖然有很多層面，但其目的無非是為經濟改革保駕護航。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一切經濟改革均無從談起。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失控過程。

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是沒有錯。但民主應該是一個在較高物質文明的基礎上提供社會和諧的手段。而如果改革家所提倡民主的結果是將一個社會引向動盪、生產萎縮、社會原有的組織全面解體，社會和諧全面倒退，則只能說改革家為愚蠢。美國帶給伊拉克的民主，不也是這麼一個結果嗎？

民主社會，和諧社會都是遠大的目標，都需要有強有力的經濟來支持。在蘇聯經濟一片混亂的時候首先需要的是利用政權的強大力量，採取一些非常手段，將經濟逐步納入正軌。其實在任何一個非常時期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集中”。連在民主的發源地古代的羅馬共和國時代，遇有戰爭和動亂也還是要授予執政官以不受元老院管束的“獨裁權”。戈爾巴喬夫在經濟上毫無起色，出現混亂的時候反而實行“休克療法”式的政治改革，無異於是一種自殺行為。筆者無意為蘇聯的官僚主義制度辯護，但可嘆可憐的還是蘇聯人民。他們自進入 20 世紀就沒過過幾天好

日子。從世紀之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革命，到強制農業集體化，緊接著又是高強度的工業化和恐怖的肅反，隨後又是戰爭，犧牲了十分之一的人口。斯大林死後，蘇聯人民剛剛過上了20幾年雖不算富裕，但還算是寬鬆的日子，馬上又要經歷一個災難性的經濟與政治的大震盪。三、四代人就在這種動盪中度過了人生，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兒。筆者認為，原先的制度不管有多大的問題，如果能夠實現平穩的過渡，較之再經歷一次大分化、大改組的休克或震盪，總還是人民的福分。而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證明瞭這一點。

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5年4月23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的搭檔利加喬夫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成為了實際上的第二把手。1985年9月27日，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年邁的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退休，由雷日科夫繼任。此間，另一位後來成為至關重要人物的葉利欽，於1985年6月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蘇共的新領導班子曾經讓蘇聯公眾耳目一新，他們第一次見到不用人攙扶，自行走到群眾中的總書記。1986年2月25日，蘇共召開27大。又有兩個重要人物進入了書記處。其一是雅科夫列夫，其二為梅德韋傑夫（與現任總統不是一個人）。此二人均為激進的改革派分子，在其後的年月裡是為戈爾巴喬夫的重要智囊。蘇聯的解體與他們的智囊角色有著重大的關係。27大後戈爾巴喬夫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當時他的地位和威望實際上對完成各項改革是十分有利的。歷史曾經給了他相當好的機遇，可惜的是他沒能把握好。

1987年1月的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著名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口號。要求“不留歷史的空白點”，“不應有不受批評的禁區”。對蘇聯各個時期的歷史問題和歷史評價的討論隨之展開。蘇聯歷史上，特別是斯大林時代的歷史因為負面的問題太多，這種討論很快便涉及到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

1988年6月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決定：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再由它選出蘇聯最高蘇維埃。戈爾巴喬夫把黨的官僚視之為阻礙改革的勢力，因此要求各地行政機構“不要幹預，要保持距離”，強調這次選舉是“自由選舉”。實際上是放棄了他所領導的蘇共在選民中的工作。其結果是，約有30名重要地區的黨政領導人落選，而大量的政治反對派（其中包括葉利欽）則當選為人民代表。這次選舉標誌著戈爾巴喬夫政權對局勢失控的開始。戈爾巴喬夫原本穩固的領導權受到了極大衝擊。雷日科夫將這次選舉稱之為：“政治休克療法”。令人費解的是，戈爾巴喬夫也有30年的從政經歷，怎麼就不懂得他的權力基礎就是他所嗤之以鼻的這些官僚，而並不是蘇聯人民。蘇共早已經就是官僚階級的黨，和人民本來就是對立的階級。但要完成戈爾巴喬夫所設想的改革，他所能依靠的還只有這些官僚。沒有這些官僚和他們的機構，戈氏就是一個光桿司令。而這些官僚在開始的時候雖然是反對改革，但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憑藉政治與經濟上的優勢，轉而成為新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如大型企業的董事長、CEO等）時，他們也會成為改革的擁護者。戈爾巴喬夫自掘自墳的歷程，就是從這次選舉開始的。

對戈爾巴喬夫政權基礎的第二輪打擊來自於由他親手提拔起來的葉利欽，時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987年10月，激進的改革派葉利欽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即席發言，向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改革政策公開地發難，對改革的進程、對黨的組織、尤其是黨的最高領導層的工作作風，其中包括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批評。1987年11月11日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解除了葉利欽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12月，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給了葉利欽重返政壇的良機。他決定參加競選人民代表。為此，他毅然辭去了部長職務，全力以赴投入競選。1989年3月，他終於如願以償，當選

為蘇聯人民代表。1990年1月，在他的積極活動下，蘇聯共產黨內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民主綱領派”、是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上“民主綱領派”公開提出蘇共放棄馬列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放棄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把蘇共建設成社會黨的主張。他們還極力主張：取消軍隊、政治部門和國家機關中的基層黨組織。葉利欽及其“民主綱領派”的主張沒有被大會全部接受，於是，葉利欽在大會結束時當眾宣佈退出蘇聯共產黨。其後，葉利欽決定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職務。經過三輪角逐，1990年5月29日，葉利欽以微弱多數險勝俄共推薦的候選人，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為首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當選使戈爾巴喬夫失去了蘇聯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支持。失去了俄羅斯，不但使戈爾巴喬夫，就連蘇聯政府，以及聯盟的所有機構幾乎都成為了無本之木。

蘇聯中央政權影響力式微的現狀，又觸發了蘇聯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的各加盟共和國“民主派”們開始鼓動各自的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首先宣佈退出蘇聯的是1940年被斯大林強行併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脫離蘇聯獨立。1991年9月6日，蘇聯最高權力機關——國務委員會正式承認立陶宛的獨立。1989年11月15日，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宣佈1940年愛沙尼亞加入蘇聯的宣言無效。1990年3月30日，恢復愛沙尼亞共和國。1991年8月20日，愛沙尼亞正式宣佈獨立。拉脫維亞於1991年8月22日宣告獨立。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表《國家主權宣言》，也宣佈俄羅斯聯邦在其境內擁有“絕對主權”。格魯吉亞1990年11月4日發表獨立宣言。1991年4月9日正式宣佈獨立。隨後幾乎所有蘇聯其餘的加盟共和國均發表了獨立或主權宣言。不承認或僅僅部分承認蘇聯憲法和法律在本國領土的效力。至此蘇聯的聯盟政府

的有效管轄面積已幾近為零。

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是否贊成保留聯盟問題舉行歷史上首次全民公決。在全蘇登記的1.85億選民中，80%的人參加了投票，其中76.4%的公民贊成保留聯盟。為了保住哪怕是形式上的蘇聯，戈爾巴喬夫提出重新簽訂“聯盟條約”。1990年11月23日，塔斯社公佈了新的聯盟條約草案。新聯盟條約規定：條約參加國賦予蘇聯的權力是：制定憲法，領導武裝力量，宣佈戰爭和簽訂合約，對外政策，簽訂國際條約，維護全聯盟市場，統一貨幣，以及管理部分國家財產，其他均歸各共和國所有。稅收方面：取消聯盟稅，改由各共和國按比例上交份額。蘇聯改國號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簡稱仍為CCCP。經反復的討價還價之後，1991年8月2日，戈爾巴喬夫發表了電視講話，建議8月20日簽署條約。首先簽約的將是俄羅斯，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三國。8月4日，戈爾巴喬夫認為已萬事俱備，去克里米亞休假去了。

就在預計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前一天，1991年8月19日，爆發了“8.19事件”。是日早晨6時05分，一批不滿“聯盟條約”、不願看到蘇聯覆滅、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所帶來的混亂感到絕望的蘇聯領導人：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內務部長普戈、國防部長亞佐夫、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通過莫斯科電臺宣佈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同時宣佈：“鑒於總統戈爾巴喬夫由於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職務，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責，全蘇聯由即日早晨4點起進入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總統戈爾巴喬夫由於拒絕與“緊急狀態委員會”合作而事實上已遭軟禁。這次是戈爾巴喬夫工作班子中的主要關鍵性人物集體背叛了他。“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立是蘇共黨內不願意看到蘇聯解體的最後一次努力，也確實是屬於一次政變。問題是政變分子們並沒有做好接管蘇聯政權的準備。派出的空降部隊和內務部“阿爾法小組”（特遣部隊）拒絕接受攻打俄議會

所在地“白宮”的命令。而“緊急狀態委員會”也沒有一個真的動用武力接管政權的計劃。所有的軍事行動僅停留於恐嚇群眾的水平。葉利欽準確地判斷了當時的形勢，遂爬上了一輛坦克，發表了〈告俄羅斯人民書〉，宣稱“以所謂緊急狀態委員會名義通過的一切決定在俄聯邦內被認為非法和無效”。到8月20日下午，政變分子們仍然未能下定決心使用武力。其實，當時的形勢對“緊急狀態委員會”還是有利的。葉利欽後來談到：“‘緊急狀態委員會’原打算8月20晚對白宮發動進攻，後改到夜裡兩點，俄領導人甚至準備逃亡美國駐蘇大使館”。¹⁷ 8月20日午夜，有三名群眾死於和軍方的衝突。“緊急狀態委員會”看到事態走向流血，遂開始出現動搖。當夜，國防部副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和空降兵第一副司令格拉喬夫公開倒向葉利欽。8月21日晨，亞佐夫下令從莫斯科撤出軍隊。8.19事件以失敗告終。8月22日2時12分，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8.19事件打亂了戈爾巴喬夫簽署新“聯盟條約”的計劃，蘇聯的解體已不可避免。

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解散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隨後，存在了近百年的蘇共自行解體，蘇共亡黨。

“8.19事件”後，葉利欽利用自己作為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總統的地位，發佈了一系列命令，將蘇聯的權力、財產和機構劃歸俄羅斯聯邦所有，使俄羅斯聯邦的權力迅速膨脹。1991年11月16日。葉利欽發佈了十項總統令，接管了聯盟中央一系列財政金融部門，剝奪了中央的重要財源。控制了能源的生產和出口，限令約80個聯盟中央的部委解散，並停止向它們提供資金。一週後，他又宣佈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管蘇聯的國家銀行、對外經濟事務銀行。同日，他下令停止蘇共的活動，撤消在俄羅斯境內的克格勃、

¹⁷ 葉利欽：《總統筆記》，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100頁。

內務部以及軍事機構中的政治機構。他還下令暫停《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等共產黨報刊的出版，將蘇聯中央電視臺收歸俄羅斯所有，並解除了全蘇國家廣播電視公司、塔斯社和蘇聯新聞社領導人的職務。爾後查封了蘇共中央辦公大樓，扯下了掛在大樓頂上的蘇共黨旗，拆除了十月革命 50 週年紀念碑。至此，戈爾巴喬夫丟掉了所有的權力基礎，蘇聯總統只剩下了一個空殼。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三國領導人公佈了震驚世界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協定”，宣佈該三國作為 1922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條約的發起國明確指出：“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存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作了最後的告別演說，正式辭去了蘇聯總統的職務。當天夜裡 12 點，蘇聯國旗黯然落下。存續了將近 70 年的蘇聯從此不復存在。筆者在澳洲的一個小鎮上，通過電視轉播，看到了降旗的全過程。

3、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比較。每每看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到蘇聯解體的這段歷史，筆者總是不禁要將蘇聯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進行一番比較。一般說來，改革的結果不外乎於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改革讓所有的人都獲得了實惠。即，原來境況好的人變得更好，原來境況不好的人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第二種是，一批原來境況好的人變壞了，另一批境況不好的人變好了，絕大多數人則是老樣子。第三種是，所有人的境況都變壞了。用這種標準來衡量，則第一種情況的改革應該說是成功的。後兩種，則是失敗的。而最後一種則屬於是絕對失敗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應該是第一種，即為成功的改革。蘇聯的改革則是最後一種，屬於絕對失敗的改革。中蘇兩國進行改革時面臨的都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問題，其結果則會如此不同，其原因應為如下幾點：

(1) 領導人的不同。在面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問題時，中蘇兩國領導人都是沒有經驗。但領導人的表現則大不相

同。中蘇兩國都是屬於難以根據大多數人的意志選擇領導人的國家，因此攤上個什麼樣的領導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儘管如此，與蘇聯所不同的是，當啟動改革開放時，中國還有相當一部分第一代領導人既在世，亦在位。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分量是戈爾巴喬夫那種蘇聯第五代領導人根本不能望其項背的。改革開始時，戈爾巴喬夫雖然也有從政 30 多年的經歷，但基本上是一個從家門到校門，從校門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而主持中國經濟改革的鄧小平，卻是曾經統率三軍，50 年代掌管朝政，三次被打而不倒的人物。他不但見識過法國的資本主義，也目睹過蔣家王朝覆滅之前通貨膨脹、經濟崩潰的災難。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經驗和鄧小平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尤其懂得了天下大亂的厲害。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從頭到尾都是處於中央政權的牢牢掌控之下。一旦有事，則可立即返回原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最具有指導性的意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最主要特點無非是兩條：1、寧可慢，不能亂；2、多做實事，積少成多。現在回過頭來再看改革開放後中國 30 年走過的道路，深感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之城府。這種外松內緊的政治環境，也確實給很多人以及很多企業以逐步發展的空間。中國很多企業是從小作坊開始，用 20~30 年的時間，完成了向支柱型企業的轉化過程。中國政府用一個一個引進外資和技術的方式，逐步完成了工業的現代化改造。在整體國力上昇的同時，中國的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中國的村村通電和村村通路的計劃，就是在這些年內實施的。當然，改革本身就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也出現過險情。大量虧損的國有企業關停併轉和工人下崗就是其中較為嚴重的一次。好在也算是有驚無險地渡過了。天上不會掉餡餅，世界上也沒有一蹴而就的好事。這種穩健務實的基本方針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特點和成功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戈爾巴喬夫則是完全相反的另類。雷日科夫曾多

次說到，戈爾巴喬夫喜歡出風頭，喜歡振奮人心的口號、群眾的歡呼。“他是一個權力慾者，時時、事事、處處都想當領袖而不管其是否有當領袖的素質”。¹⁸ 他喜歡時髦的服裝、國際舞臺上的風光，卻很少有心，或有時間靜下心來研究一下既具體又現實的蘇聯經濟問題，從而據此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也正是由於缺乏務實的作風，遇到不同的經濟改革方案，戈爾巴喬夫感到無所適從，更缺乏敏銳的判斷力。戈爾巴喬夫面對致命的休克療法時，表示“更欣賞沙塔林計劃”（即“五百天計劃”），在激進的和穩健的兩個計劃（五百天計劃和政府計劃）中間左右搖擺，均證明瞭此人對經濟問題既缺乏主見又拿不出成熟的意見。華而不實的作風害了戈爾巴喬夫，也坑害了蘇聯人民。

（2）方式不同。由於領導人不同，改革的基本方針不同，改革的方式自然也不盡相同。改革伊始，中國和蘇聯均處於經濟困境之中。而中國因為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情況比蘇聯還要差很多。當時的中國已處於“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人民缺糧，缺肉，缺油，缺用，缺穿，缺房。一切都要憑票證。出行難，買菜難，總之沒有一樣不短缺。當時就有中國的經濟專家指出，中國的困境屬於“結構性經濟危機”。但中國的改革，卻不是從改革經濟結構開始，而是從最不涉及整個經濟結構，而又和人民關係最為密切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即，改革從中國經濟的邊緣開始，逐步擴大到城市小型企業，再擴大到中型企業，真正的大型企業改制則一直到90年代末期才開始。而四大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則在進入21世紀後才依次開始實施。中國改革的特點是，由外及裡，由表及內，逐步改革，以又一次“農村包圍城市”、螞蟻啃骨頭的方式完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造。價格改革也是如此，中國沒有一下子放開價格，更沒有實行震盪和休克性

¹⁸ 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第278頁。

的價格政策，而是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實行了價格雙軌制，甚至對外匯都實行了一段雙重比價。對農產品漲價部分，還給與了一定的補貼。這種價格的雙軌制，確實有很多弊病，即滋生了官倒，也出現了黑市。但價格雙軌制也確實保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價格相對穩定。至少沒出現價格的崩盤。

蘇聯則不同。1987年6月，戈爾巴喬夫上臺後不久，在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就對半數以上的企業實行了“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實行完全的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的政策，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失控。有人講，蘇聯和中國不同，蘇聯的工農業的專業化程度高，所以不具備中國式的經濟邊緣領域。要改革，只能從經濟結構改革做起。筆者對此種看法頗不以為然。蘇聯有廣袤的國土，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農民僅擁有的自留地面積就高於中國人均耕地面積，自由市場（巴扎市）在俄國及其他共和國也很有傳統。而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也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如果在改革之初，近兩千億盧布的資金不是投向重工業，而是對農業多加扶持，農產品短缺的狀況一定會很快改觀。蘇聯農產品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僵化的管理，以及價格不合理或失控造成的。改變起來較之工業體制和生產的轉軌還是要容易很多。

（3）對穩定和動盪的不同認識。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經歷了動盪的十年文革之後開始的。動盪所帶來的災難，還是剛剛過去的記憶。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穩定是第一位的”幾乎成為上至鄧小平下至普通百姓的共識。穩定的政治環境保障了經濟改革所需要的空間和時間。蘇聯則不同。動盪的二戰已經成為遙遠的回憶。新一代人對現狀積怨已久，希望徹底結束死氣沉沉的制度，卻又不知道動盪為何物。從戈爾巴喬夫到知識界，乃至一般民衆均熱衷於集會，遊行，發表演講，提出吸引眼球的口號。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宣洩自己的看法，對社會一步一步走向動盪渾然不覺。在這點上或許可以說是兩國國民在對待改革問題上

存在的心理差異吧。蘇聯的這段歷史後來反過來又教育了中國人，即，激進的改革會引起動盪，因而是危險的。

(4) 戈爾巴喬夫用人不當。筆者在這一問題上倒是有些贊同張文的觀點。對戈氏的改革破壞性最大的就是他親自提拔到莫斯科的葉利欽。另外兩個改革的設計者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則要為改革的失敗和蘇聯解體負責。儘管如此，筆者並不認為戈爾巴喬夫發動改革是為了消滅蘇共和蘇聯。他的初衷還是在蘇聯建立一個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他曾希望蘇聯的改革“與鄧小平在中國實行的改革方法頗為近似”。很可能戈氏的重要智囊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掘墓人的身份出現的，但戈爾巴喬夫則一直希望並努力的目標是改造蘇共和保留蘇聯。他之所以沒有能夠達到目標，主要是因為遇有大事缺乏主見，沒有能夠牢牢抓住政權這一最有力的工具，最後反而被各種勢力所左右。也就是說，因為他的無能。在這一點上他是徹底不能與鄧小平相比的。當戈爾巴喬夫宣佈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時，他已經是一個空殼總統，已經成了葉利欽手中的木偶，即使他不去解散，也有人會替他去辦的。他曾最後寄希望於解散蘇共還有機會保住蘇聯，這也是他的另一個天真或愚蠢之處。用人不當的結果就是大權旁落，這是歷代政治鬥爭的鐵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是一個因用人不當而眼看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過程。

五、結束語

— 蘇共亡黨之後蘇聯解體是否是必然

上文中，我們幾乎將整個蘇聯的歷史作了一次綜述。通過這些敘述，恐怕應該可以得出一些相應的結論，即，蘇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它的解體又意味著什麼。借此，也可以給所有深受 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共產黨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們以一定的參考。

首先，列寧雖然在組織和策劃革命，以及保衛革命政權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因去世太早，列寧並未能，或未來得及建立一個他心目中的政治制度。而列寧心目中的政治體制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也只能從他的著作中猜測一二。我們後來所見到的蘇聯式的經典社會主義，則是斯大林的作品，或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這一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可怖的獨裁政權。這一政權的統治階級是掌握著一切蘇聯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官僚階級。它的組織制度則是任命制。雖然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也取得了一些斐然的成績，但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實在難以和傳統的社會主義理念聯繫在一起。從現有的資料和列寧的遺作來判斷，列寧所希望建立的政治制度應該和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有著完全不同的模式。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也並沒有打算將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改造成列寧所期望的制度。實際上赫魯曉夫並不瞭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奧道理。據赫魯曉夫的兒子回憶，他最主要的信條僅僅是“希望蘇聯人民過上好日子”。至於怎麼做，他心目中卻只有一個斯大林的方式。赫魯曉夫至死都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從未打算從根本上改變斯大林的政治經濟體制。他雖然批判了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但其目的還是為了給這一制度減壓，使之至少讓常人可以接受。或曰，他理順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因此赫魯曉夫也從未打算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是後來中國黨強加於他的。

其次，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理論，是當時蘇聯社會階級結構改變的必然結果。當傳統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官僚階級又是被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時，失去了被專政的對象階級的結果，就只能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並提出這麼兩個“代表”全民利益理論，以說明蘇共執政的合法性。

再其次，戈爾巴喬夫所接手的蘇聯繼續奉行的是從斯大林、赫魯曉夫一脈相傳下來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在改革的初期，他也

曾希望過哪怕是部分地回到列寧的理念。而這卻正是他的幼稚之處，他未能明白他所代表的蘇共本身早已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黨。他的改革首先觸動的是官僚階級的利益，沒能兼顧到官僚階級的利益或希望，因而受到了官僚階級的強烈抵制。1991年8月19日，官僚階級終於和他翻了臉，發動了旨在將戈爾巴喬夫趕下臺的未遂政變。政變的結果是戈爾巴喬夫失去了作為總統而賴以存在的官僚機構，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光桿司令。另一方面，由於戈爾巴喬夫先天的缺點，華而不實和軟弱妥協的作風，以及經濟工作上的無知，他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雙雙失控，造成了蘇聯社會的極大混亂，既失去了民衆的支持，最後又被政治反對派借民衆之力趕下了臺。戈爾巴喬夫初衷並不壞，最後卻落得左右不逢源，裡外不是人的結局。

其實，戈爾巴喬夫有過很多機會，如果不是因為他的軟弱、和稀泥的折衷主義以及優柔寡斷，本來也可能會有另外一種結果。比如說當葉利欽被逐出蘇共中央政治局時，有人曾建議將葉利欽發配到國外當大使，使之遠離蘇聯的政治中心。此議被戈爾巴喬夫所否定。政治鬥爭中的這種婦人之仁往往是災難性的。沒有了葉利欽，俄羅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就會是俄共的候選人，結果可能會因此而完全不同。再之，當“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求戈爾巴喬夫合作時，如果他能認清形勢，答應合作，至少還能獲得官僚機構的支持，不至於最後成為一個光桿司令。當然，事態會如何發展是任何人難以估計的，但至少這是一個另外的選擇。另，如果戈爾巴喬夫確能審時度勢，在新蘇聯聯盟條約即將簽署之際不離開莫斯科去克里米亞休假，結果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最後，當葉利欽和烏克蘭、白俄羅斯總統在別洛韋日密謀解散蘇聯時，俄羅斯的KGB主席曾密報戈爾巴喬夫有關三位總統開會的內容。當然此時採取任何措施恐怕為時已晚。但如果戈爾巴喬夫能夠聽從一些人的建議，孤注一擲，下令逮捕三位私自開會的總統，沒準也還能絕路逢生。另外，“緊

急狀態委員會”既然已經成立，就表明他們已經拉開了和葉利欽決鬥的架勢。已經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沒有回頭路。如果當時國防部長亞佐夫橫下心來，命令攻打俄議會——白宮，葉利欽等人肯定會跑進美國使館。害怕內戰就別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誠然，爆發內戰可能是更糟糕的結果。但也很有可能僅此輕輕一擊，葉利欽們從此便離開了俄羅斯的政治舞臺。當然歷史上是沒有如果的。一切已經發生了，也許也應該這樣發生。但無論如何，當時的蘇聯還是有可能不被解體而存在下去的。

實際上蘇共和蘇聯是兩個概念。一個是黨，一個則是國家。雖然他們是相繼滅亡的，但他們的共同消亡之間並沒有邏輯關係。有一種很大的可能就是蘇共亡黨，而蘇聯則以某種形式存續下來。沒有蘇共的蘇聯的存在，對後來災難深重的蘇聯人民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由於固有的經濟聯繫尚存，也許可以使災難的程度至少有所減緩。但需要記住的是，俄羅斯人向來以歐洲人自居，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屬於歐洲大家庭的。對亞洲國家有著根深蒂固的歧視。霸權主義並不是蘇聯的專利，自古以來俄羅斯人崇尚的就是擴張主義和霸權。長期以來，蘇聯由於有共產黨的存在，和西方國家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一旦沒有蘇共的蘇聯在經濟上緩過勁來，或和西方國家聯手，或自己舊態復萌又重新拾起擴張主義的招牌，對世界，對中國而言都不是什麼幸事。還是散了的好。沒什麼可惜的。如果能散得再小一點，則更好。

如果說，蘇共的亡黨亡國是一個歷時 35 年的過程，它始於 1956 年蘇共 20 大對斯大林的批判，完成於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的解體，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的總根子則是斯大林種下的。真正背叛了列寧理念，也就是列寧主義的人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曾是試圖修補或挽救這一制度的改革派。憾之，他們都沒有成功，而他們的失敗則是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的。